

我与改革开放40年

一台电视机，两代人不同的回忆

●牛莉萍



图片来源：网络

今年，我们迎来了改革开放40周年。这40年，人们的通讯方式从写信变成了手机，出行从过去的自行车变成了如今的高铁、飞机，普通老百姓的衣食住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市民樊志鹏是一名90后，8月6日中午到东关一家家电卖场为婚房选购电视机。樊志鹏：“选购电视机，一个就是屏幕，再一个就是看性价比，屏幕是LED的，我们看距离的话，4米左右，大概就选个55英寸

到56英寸之间，价格一万五千块钱以内的吧。”

出生在上个世纪60年代的市民于国庆说：“我特别喜欢过去的老物件，老物件是一种回忆、一种情怀，所以我家的第一台黑白电视机，直到现在还保留着，虽然只有三个频道，12英寸屏幕，但是却承载了我童年全部的回忆。”

最终，樊志鹏选购了一台一万多元的尺寸大屏幕彩色LED电视。他说，电视机是日常生活中再平常不过的家电，他买电视不太关心价格，在意的是电视机的品牌和功能。樊志鹏：“看品牌的口碑，看屏幕的质量到底怎么样，还要看后期的产品质保、售后服务这些东西。”

而于国庆说，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电视机是多数家庭里第一台“大件”，买一台电视机要花掉全家一年的积蓄。

于国庆：“家里的第一台电视机，是1978年买的，海燕牌的，是国产、纯黑白的，木壳、12英寸。当时大概是500块钱买的，就是一般一个人工资的十倍，那时一般人平均工资在45到60块钱之间。”

于国庆告诉记者：“我所有的学习和对外面的了解都是通过电视机。忙完一天的

活儿，全家在一起吃过晚饭，就等着看新闻联播，看电视连续剧。过去电视机就12个频道，只能收到三四个台，但它陪伴我看了很多很多年，我依稀记得看过的电视剧比如阿童木、从大西洋海底来的人、霍元甲等。”

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电视机、收音机这些家电是人们了解世界的主要途径。而如今，互联网、电影、手机移动设备层出不穷，人们的文化娱乐方式变得越来越多元化，内容也更加丰富。于国庆说，自己现在也看电影、用智能手机，他感叹改革开放40周年，自己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

于国庆：“在以前，家里买一个大件，需要举家去存款。而现在，一个月工资能买几件过去买不到的东西，并且质量性能远超过去。所以我觉得改革开放这么多年来，我们的生活质量，包括我们的精神面貌，都得到了极大的提高。”

随着技术的发展，如今的电视机屏幕从黑白变成了液晶，大小从12英寸变成了100多英寸，频道从3个变成上百个，像录音机之类的家电已经退出了我们的生活，但是正因为这些家电的改变，深刻改变了人们的通信和娱乐方式。回望过去，这些老家电依然是成长在那个年代的人们最珍贵的回忆。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典语句解读(十二)

42.仓廩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

——管仲

【释义】(百姓的)粮食充足才能懂得礼节，丰衣足食才会知晓荣誉和耻辱。

【感悟】这句话最早由管仲提出。在管仲看来，民众的伦理道德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在社会生活中后天形成的，是因时而异的。而且一定的道德观念是与人们一定的生活水平相应的，只有粮食充实、衣食饱暖，荣辱的观念才有条件深入人心，老百姓也才能自发、自觉，且普遍地注重礼节、崇尚礼仪。管仲的为政思想切合了老百姓的认知心理，因此具有超越时代的价值。

43.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

——《礼记》

【释义】玉不雕琢，不能成为器物。人不学习，不懂得道理。

【感悟】这句话体现了儒家学派中孟子所倡导的性善论的哲学思想，将初生的人比作天然的璞玉那样具有美好的素质，经过琢磨，可以雕刻成精美的器物。这句话一方面承认人所拥有的天赋潜能，另一方面又强调人才的成长必须通过学习，肯定了教育的必要作用。同时，进一步指出了教育的社会作用，通过儒家的王道精神，把教育提高到“建国君民”的重要地位。

44.不富无以养民情，不教无以理民性。

——《荀子》

【释义】如果不使百姓生活富裕就无法培养百姓的感情，没有教育就无法改造百姓的思想。

【感悟】荀子将孔子富教结合、以成王道的思想进一步阐释，使之具体化，认为王道政治包括了富民和教民两个部分，对民众实行教化要有一定的物质基础，也就是说，首先要满足老百姓物质生活方面的需求，让他们富裕起来，然后才有可能对他们实行教化。

来源：《厚德汝州》微信公众号

医术高明暖人心 患者家属送锦旗

7月25日，市中医院上演了温馨的一幕，一对夫妻托女儿将一面写有“医术高明暖人心、良医高尚解病痛”字样的锦旗送到中风科一病区医护人员的手上，不停地表达着感激之情，感谢中风科主任高永义、主治医师栗清显、医师杜丹阳的治疗，感谢护士长曹云霞及科室全体医护人员给予的无微不至的关心和照顾。

据了解，患者乔某及妻子，均患有脑梗塞、高血压、冠心病。两人先后因病丧失劳动力，家中有四个孩子，大儿大女已成家，二儿在北京求学，小女在家中照顾瘫痪的父母。从2012年至今，夫妻两人在中风科一病区求治。住院期间，高永义时常叮嘱医护人员，患者家庭贫困，要尽量减少不必要的花费，争取做到花最少的钱，让患者得到最好的治疗及救助。并且根据国家的扶贫政策，患者入院后可以“先住院后付费”，报销比例也大幅度提高，并免费发放毛巾、脸盆、香皂、牙刷、牙膏、杯子等日常用品，也很大程度缓解夫妻二人的经济压力。患者夫妻行动不便，只有一女在身边伺候，市中医院积极响应“两免”“五优先”政策，开通“绿色通道”，患者夫妻在医院扶贫志愿者陪同下，优先检查，优先取药。通过6年的精心治疗，夫妻两人目前病情稳定，未再复发。

王泽鹏

洗耳河来了大黄鸭



本报讯（记者 宋乐义）8月7日，在洗耳河景观带，两只数米高的大黄鸭在河中畅游，向市民们展示着它们的可爱，大黄鸭的翅膀上还写有“保护母亲河”的字样（如上图）。

据了解，这是我市开展“保护母亲河，我们在行动”活动的一种宣传方式。活动由市文明办和水务局主办，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和双拥路美家国际家具城协办，倡导让汝州“母亲河”更加清澈，让我们的城市更加美丽。

“保护母亲河行动”是一项大型的群众性社会公益活动，主要目的是动员包括青少年在内的广大社会力量，倡导和树立绿色文明意识、生态环境意识和可持续发展意识，为我们城市的生态环境建设做贡献。

别做“路怒族”

●刚鑫雨

8月6日，笔者临时接到采访任务，由于时间紧张就决定打车前往目的地。司机师傅看起来经验老到，心想应该不会迟到。没成想，在经过拥挤路段时，司机为躲避行人突然变道，一辆紧随其后的私家车似乎受到惊吓，加速赶上出租车摇下车窗便开始了一通语言攻击。

身处汽车社会，似乎任何有碍“路怒族”行车的举动都可能让他们怒不可遏。在过去，我们习惯于将这些行为归为素质问题，其实是文明意识还没跟上发展速度，行车文明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扎根于社会文明的土壤之中。举一些例子来说，当我们只考虑自己方便而占用消防通道的时候，有人喜欢占用应急车道就不奇怪了；当我们插队成为习惯的时候，有人习惯于与行人抢路就很正常了；当我们动不动就容易动怒而崇拜暴力时，司机间对峙、鸣笛、吵起来打一架也就解释了……

其实，很多“路怒族”平时都有理有节，只是一开车上路就变得暴躁易怒。我们不妨想想，银行提供座位、叫号，熙熙攘攘的排队乱象自然消失，这说明权利归位才会秩序井然。面对“路怒族”，除了加强社会文明建设，加大执法力度之外，我们还需要进一步完善硬件基础设施建设，尽量科学化、人性化，特别是要将“公交优先”真正落到实处，给“路怒族”提供不开车的选择。

明白“路怒”的危害，就该从我们自己做起，开车之前自觉调整身心状态，家人朋友同事多提醒；同时，也需要全社会一起努力，防范因不文明现象泛滥造成而助推“路怒族”的不冷静情绪。

评论

·连载·

毛泽东离京 巡视纪实

这一天，中央以毛泽东的名誉向日本、印度尼西亚、泰国、马来西亚（今马来西亚）、缅甸、锡兰（今斯里兰卡）等国家的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发出邀请信，邀请他们派遣代表团前来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15周年国庆典礼。

17日，毛泽东对有关赫鲁晓夫攻击毛泽东谈话的一个材料作了批示：刘、周、彭、朱、陈、陶，退毛。还是上一次谈过的老话。以威胁为防御。色厉内荏。全世界多数舆论，都不以为然。

毛泽东 九月十七日

9月18日，毛泽东离开上海。19日，专列途经南京。

毛泽东在南京接见了刚果(布)工人联合会领导人、刚果(布)国民议会第一副议长坎布·儒利昂和夫人。

晚上，专列途经济南。20日中午，毛泽东在济南接见了阿尔及利亚政府经济代表团，同他们进行了谈话。

毛泽东说，过去有一个时期我们不重视农业和轻工业，就发生许多问题，粮食不够，轻工业品不够，吃、穿、用都不够，恰好这些是广大人民生活的必需。同时，这两个方面是积累资金的主要来源。要自力更生，非积累资金不可，靠帝国主义是不行的。有些兄弟国家把专家撤走，这一来我们不得不自己干。

技术、资金从哪里来呢？任何外国不贷款给我们，我们也不愿向外借。技术从哪里来？都得靠自己。当然从外国购买一些技术，如我们从英国、法国、西德、意大利、日本进口一些技术，但是要付款，不然他们不给，只好把建设拖长一些。要很快建设先进的工业、农业、国防、科学技术是困难的，把时间放长一些就可能了。过去我们在国内发公债，现在不发了，正在还。我们欠苏联的外债，明年就可还清，明年再还1700万外债就没有了，至于内债，国内公债到1968年就还完，现余很少了，欠了一身债日子是不好过的。

毛泽东说，中国现在还不行。中国经济上还没有站起来。大概再有一百年，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区别中国人和日本人是不一样的，看起来中国人和日本人都是黄脸皮，但是两个民族。

下午，专列离开济南继续北上。晚上，专列到天津。翌日，专列离开天津，当天回到北京。

第十章 酝酿发动“文化大革命” 五十一 重上井冈山

1964年12月至1965年1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刘少奇的“四清”工作路线受到了批评，通过了毛泽东主持起草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

中央工作会议以后，毛泽东对怎样具体地推进“四清”运动很少再谈起。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变化。出现这种变化，并不是由于他认为“四清”运动所要解决的问题已经基本得到解决；恰恰相反，随着“四清”运动的深入发展和运动中暴露出来的种种问题，使他对不少干部严重脱离人民群众，以至同群众相对立的问题越来越感到忧虑。他十分担心：这种状况如果不改变，继续发展下去，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便不能巩固，甚至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重危险。

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时的讲话中，他已透露出这种想法：“你只要不触及全面问题，枝枝节节、修修补补不行。”也就是说，他在考虑单靠城乡“四清”运动仍不足以使问题得到全面解决，需要寻找出一种能够全面解决问题的新途径和新方法。

会议结束的第二天，他阅读了在洛阳拖拉机厂蹲点的第八机械工业部部长陈正人给薄一波的信。信中说：经过蹲点，“开始发现了厂里从不知道的许多严重问题。这些问题，如果再让其继

续发展，就一定会使一个社会主义的企业有蜕化为资本主义企业的危险”。“特别值得重视的是：一部分老干部在革命胜利有了政权以后，很容易脱离群众的监督，掌管了一个单位就往往利用自己的当权地位违反党的政策，以至发展到为所欲为。而像我们这些领导人，官僚主义又很严重，对下面这些严重情况又不能及时发现。这就是在夺取了政权之后一个十分严重的危险。”薄一波在旁边批道：“这是个问题。所以成为问题，主要是由于我们多年来没有抓或很少抓阶级斗争的缘故。”毛泽东接着就批了一段分量更重的话：“我也同意这种意见。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

陈正人在信中还写道：“干部特殊化如果不认真克服，干部和群众生活距离如果不逐步缩小，群众是必然会脱离我们的。”毛泽东又写了一段批语：“如果管理人员不到车间、小组搞‘三同’（指同吃、同住、同劳动。——引者注），拜老师学一门至几门手艺，那就一輩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不学会技术，长期当外行，管理也搞不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行的。”

然而，当时主持中央“一线”工作的领导人和许多大区、省一级的领导人对此却没有作出相应的反应。这使毛泽东非常不满。自1959年以来，党内高层领导中对形势估计、农村“包产到户”等意见分歧，一步步积累起来，更使他认定问题首先出在党的上层。他对身边的护士长吴旭君说：

“我多次提出主要问题，他们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话他们可以不听，这不是为我个人，是为将来这个国家、这个党，将来改变不改变颜色、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我很担心，这个班交给谁我能放心。我现在还活着呢，他们就那样要是按照他们的做法，以及许多先烈们毕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诸东流了。”

“我没有私心，我想到中国的老百姓受苦受难，他们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众，不能让他们再走回头路。”

“建立新中国死了多少人？有谁认真想过？我是想过这个问题的。”

毛泽东逐渐形成这样的想法：中国会不会放弃社会主义而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关键还不在于城乡基层，而是在上层，尤其是中央，比如在中国自上而下地出修正主义，它的危险比自下而上地出修正主义要大得多，也快得多。他对如何巩固社会主义制度、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关注重点有了很大变化。这从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过的几句极不寻常的话中，可以看得很清楚。他说：“先搞豺狼，后搞狐狸，这就抓到了问题。你不从当权派着手不行。”“杜甫《前出塞》九首诗，人们只记得‘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这四句，其他记不得了。大的倒了，其他狐狸你慢慢地清嘛！”“二十三条”中规定“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是点出了这个问题。

(未完待续)